

中国常用外国语类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第二、第三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

外语教学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双月刊) ISSN 1000-5544

ISSN 1000-5544



9 771000 554992

2008 专刊

西安外国语大学主办

目 录

· 语言学与语言研究 ·

他哉? 她哉?

- 第三性别指示语的认知语用理据 宋 艳 侯国金(1)
- 浅析隐含言语对含意理解的元语用调控 廖迅乔(4)
- 基本隐喻模式与语篇连贯 李万轶(7)
- 多模式话语分析在高校英语报刊教学中的应用 赵 虹(10)
- 运用功能文体理论的语篇分析探索
- 对诗歌《未选择的路》的功能文体分析 张文茹 李 耸 杨 勇(13)
- 广告篇章世界的建构与时空转换 丁大刚(16)
- 中国中高阶英语学习者异质词汇搭配行为成因初探 孙纯洁(20)
- 罗仁地教授访谈录 薛 琳(23)
- 中国学生英语句子解读的机制:论元结构构式和可供性 董凤艳 冯 奇(26)
- 中国学生英语口语产出过程的特点
- 基于语料库的停顿现象研究 周荣辉 马小雷(30)
- 谈汉语母语日语学习者对格助词「を」的误用
- 以母语干扰为例 龙绚丽(35)
- 基于语料分析的话语标记语的认知语用功能 林美珍(37)
- 隐喻喻体选择的顺应性研究 曾楚芝(40)
- 也谈语言中的语义偏移现象
- 兼论语言研究中的论证循环 马 刚(42)
- 从语言经济原则角度看英语广播新闻的结构简约 张良军(44)
- 试论社会语言学的跨学科属性 张廷国(47)
- 优选论对重音问题的分析 王茂林(50)
- 论日语中汉语词汇的促音现象 钱力奋 邱根成(52)
- 19世纪西洋人韩语语法研究动因考 崔晓玲(55)
- 俄汉时间隐喻的对比研究 王淑杰(58)
- 农业英语论文摘要的语篇特征分析 高怀勇(61)
- 英汉词义的演变之比较 张朝晖(63)
- 隐喻的认知本质与文化教学研究
- 论“通过隐喻教文化” 辛雪艳(66)
- 英汉属格标记对比 朱 英(68)
-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的碰撞
- 不同思维方式对语言学、文学理论与哲学的影响 关永平 郭燕秋(71)
- 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化理论与英语词汇教学 朱焱岭(74)
- 英语中某些对语素信息敏感的音系过程之词汇音系学解释 葛 玉(76)
- 乔姆斯基语言观的哲学误区
- 三议乔姆斯基的语言知识先天论 杨秀珍(80)
- 论 X' 理论的缺陷及新的表征句法关系的框架 常 鸣(83)
- 浅析英语句子朗读的节奏 章何利(86)
- 当代科技英语语体特点再认识 李惠林 白玉江(89)
- 浅析专有名词作指称语的语用功能 苗 露(93)
- 英语“女性语体”的特征及形成原因探析 廖素清(95)

罗仁地教授访谈录

薛琳

(北京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83)

引言

罗仁地(Prof. Randy John LaPolla)是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语言学系教授、主任,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RCLT)研究员,其社会学术兼职有澳大利亚语言学学会会长,国际双语学会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专家委员会委员,长江学者,《汉藏语区语言学》(*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的主编。他1981至1983在北京大学进修语言学,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语言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汉藏语系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语法化论,功能句法,语用学,人类语言学(曾经调查过的亚洲语言有:柬埔寨语、汉语方言(闽南话、北京话、上海话、广东话),独龙语(独龙江北部、中部、南部方言,怒江方言),羌语(多种方言),日旺语(Mwtwang, Dvru方言),菲律宾大嘎乐语和越南语。他有关濒危语言的描写(羌语、独龙语),原始汉藏语形态的构拟和历史演变、语法关系的类型研究方面的专著有十几部,用中英文发表的论文有四十几篇。本文作者在2007年7月在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了解到罗仁地教授的学术成就,深感有必要让国内更多语言学研究者了解这样一位外籍汉藏语言学专家。回国后,笔者于2007年10月在中央民族大学对罗仁地教授进行了学术采访。本文是对采访录音的编译整理。

薛琳:(以下简称薛)您在中文语言学研究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请您谈谈中国对您的影响。

罗仁地:(以下简称罗)中国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从七十年代开始学汉语,也就是三十几年前了。学汉语影响了我整个学习和研究的方向。说实话,我原来对中文并不怎么感兴趣,我对日本文化和日语还有越南语更感兴趣,是由于越战的影响(我是反对越战的,同情越南人)。我没有办法学越南语,因为教越南话的都是军方,教的内容很有限。另外,因为我住在纽约长

岛,也没有人教日语。后来偶然认识了一名教汉语的人,他是中美友好协会的,免费教汉语,我每周都到他家去上课。我当时学汉语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想读先秦文学,二是既然没有机会学日语和越南语,中国是亚洲之母,学会了母亲的语言,也就可以了解到中国文化对日本和越南的影响,虽然中文和日语及越南语没有什么亲属关系,可还是有很大影响。一经学习,才发现越学不懂的东西越多,也越上瘾,不能离开,这样一学就是三十几年。可以说中文学习影响了我一生走的路,找工作、求学、研究都和中文有关。

薛:我在您的个人网页上看到,您曾经把三位中国语言学家编入了世界《语言及语言学百科全书》。

罗:是的。他们是王力,赵元任和李方桂。我和李方桂教授的接触主要是在伯克利大学的时候,我每周到他家去录口述历史。他在藏语方面的著作对我影响很大。他为人十分谦和,又有幽默感。我认为赵元任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语言学家,到目前为止,他的《汉语口语语法》仍然是最好的,没有人能超过他。有一点我想说一下,他主要是受结构派(structuralism)的影响,这方面吕叔湘、王力的看法也是类似的。他们认为汉语是 topic-comment(主题—陈述)语言,无一例外。但目前国内语言学界对此有争议。我在这个问题的观点上与结构派相近,在“Chinese as a topic-comment(not topic-prominent or SVO) language”一文中阐述了我的观点。我认为“没有必要用任何语法类别,比如主语、直接宾语来解释汉语的句法结构,在对汉语句子进行信息结构分析后,发现SVO结构假设是存在问题的。”我在北大进修的时候,和王力探讨过一些学术问题,看过他不少汉语史方面的书。另外,他在古汉语方面的著作几乎成为了我的工具书。

薛:您学习和研究汉藏语系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程,请您谈一下对您影响比较大的几次学术经历。

罗:在北大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历影响了我以后发展的路。在北大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汉藏语概论课,那

参考文献

- [1] 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
- [2] Howarth, P. *Phraseology in English Academic Writing: Some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Dictionary Making*[M].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96. 47.
- [3] Howarth, P. The phraseology of learners' academic writing[A]. *Phraseology: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C]. (ed.). A. P. Cowi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161-162.
- [4] Larson, Mildred L. *Meaning-based Translation: A Guide to Cross-language Equivalence*[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7:159,160.
- [5] Lewis, M. *Teaching Collocations: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Lexical Approach*[M]. Hove: Hove Language Teaching Publications, 2000:54.
- [6] Partington, A. "Utterly content in each other's company": Semantic prosody and semantic prefer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2004, 9(1): 31-156.
- [7] Sinclair, J. McH. *Corpus, Concordance, Colloc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109-115.
- [8] Stubbs, M. *Words and Phrases*[M]. Oxford: Blackwell, 2001.
- [9] Wehmeier, S(ed.).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责任编辑 雨函】

是我第一次接触少数民族语言,因此我有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方面的基础。当我到伯克利大学的时候,去听马提索夫教授(Prof. Matisoff)的课,我开始对藏缅语、东南亚语言感兴趣。汉语方面有很多人在作研究,我只做过一些语法研究,语音现在已经不做了。汉藏语系中有那么多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需要有人去描写,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去做这方面的研究。总的来说,北大的经历对我影响非常大,基本确定了我的研究方向。我在那里打下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基础,在国外有西方语言学的基础,还有现代语言学的训练,两方面相结合,就相通了。

薛:可以请您谈谈对您影响比较大的学术思想和学者吗?

罗:可以。20世纪70年代我在美国时,也学过形式派的东西。因为当时Chomsky在美国是主流。我学的时候觉得它象一种逻辑游戏,也蛮有趣的。可是后来觉得用处不大,和实际语言没有多大关系。放弃了句法以后,我就开始做语音方面的,也就是实验语音学。后来到伯克利,我接触到“功能派”,发现功能派的理论比较适合理解汉语。Chomsky的理论很难拿来理解汉语,汉语很多结构和他们(形式派)说得都不相符,当时我正在寻找能帮我理解汉语的理论。我学了很多句法理论,后来发现有一种叫—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 (Van Valin),他的理论没有像其他大多数句法理论一样从分析主语、谓语入手。这里我有必要说一下,大部分句法理论从研究英语入手,然后想应用到别的语言,以为英语是最典型的语言。而从类型学的角度看,英语是一种比较怪的语言,并不带有普遍性。Van Valin和De Foley在作句法时,完全用的是另外一种方法,不从英语开始,而从和英语大不相同的语言着手,如美国印第安的Lakota语,或菲律宾语。因此,我和他们学了很长时间,而且和Robert D. Van Valin合作写了一本书*Syntax: Structure, Meaning, and Function*(句法:结构,意义和功能)。这样,我又转到做语法方面,尤其是历史语法方面。后来,我接触的语言越多,越发现类型学很重要。我作类型学主要通过描写比较,但只限于我所熟悉的语言,像英语、汉藏语、日语、菲律宾语等。在1996、1997年,我一方面做汉藏语语言演变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作语用学的研究。开始的时候,这两方面是分开的,后来悟出来一些新的想法:我发现交际不完全是靠语言的,语言是种工具。交际的时候可以不用语言,可以用表情、手势等。人类共有一种生存能力,就是推测,就像我们生存必须要吃饭一样,生活在社会中,要靠推测来了解自然现象,推测是一件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们要推测别人做某件事的意图,要“猜”,当一方有意识要另一方猜时,就是“communication”。语言则缩小了“猜”的范围,具有制约推测的功能。这个理论我们叫“grammar as constraints on interpretation”。这个问题“Relevance theory(关联理论)”中也讨论过,但因受形式主义的影响,他们是在相对小的范围内讨论,认为存在“encoding(编码)”和“decoding(解码)”。我认为没有“encoding(编码)”和“decoding(解码)”,完全是“inference(推测)”。由此我联想到语言的发展。我研究语言历史的经验使我看到这个理论和语言发展的关系。人与人交际中,如果一方要制约另一方的推测结果,或缩短对方推测过程,就要使用某个语言结构,这个结构使得对方的推测更直接和准确,以达到交际的目的,实现说话人的意图。如果说话者第一次用成功,他就会用第二次。别人听到他用,用的成功,别人也会用,推而广之,大家都会用,这样就变成一种“convention(规约)”。这个发现对我来说是个突破。2002年我在《中国语文》发表了一篇文章“信息传达的性

质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与潘露莉合写),阐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每个语言是独特的,不同语言在不同方面制约对方的推测过程。某一种语言为什么制约这方面,而不制约那方面,因为这方面对说这个语言的人来说比较重要。比如说英语有“时(tense)”的标志,那么在这方面的推测就受制约,汉语没有“时”的标志,句子不一定制约这方面,至于制约的程度有多高,不同种语言又有不同。比如,英语有过去时,但只有一个过去时,我说“I had dinner.”和“I went to Tibet.”都用过去时,对方要猜,吃饭是多久以前,去西藏是多久以前,这个推测不受制约。可是日旺语(我在缅甸调查的语言),有四个过去时,制约是几个小时之前的,还是几天之前的,还是几年之前的,都有制约,所以听话者的推测过程就更受制约。各种语言制约的方法不一样。像汉语我说“我要洗头”,洗的是谁的头发不受制约,如果没有特殊语境,一般指洗自己的头发;而英语要说“I am going to wash my hair.”,一定要加“my”,用名词上的标志来制约这方面的推测;日旺语则用动词上的反身后缀来制约。所以要了解一个语言,要采用归纳法,看制约哪些方面,制约的程度如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制约,那就可以有比较好的描写。

薛:做语言学研究需要一种类型学的视角,不管是研究某一种语言还是跨语言研究,类型学的意识会提供一种正确的研究范式,不至于局限在个别语言范围内而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所以我想请您谈谈您研究语言类型学运用的研究方法。

罗:最基本的就是尽量用自然的语言资料,而不是去想象、创造句子。包括描写母语,也一定是研究“的确有人这样用的语言”,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了解自己是如何运用语言的。像Lambrecht曾经举的例子,“there was a farmer had a dog”,他的确录到了这样的语言。再比如说汉语,如果你去问一个汉语语法学家,“汉语的关系子句能否出现在中心词后面”,他会说“绝对不行”,可是我在实际生活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薛:您说的是“natural language(自然语言)”吗?

罗:对,就是“natural language”。我们有些intuition(直觉)是“prescriptive(规定性的)”,我们认为应该是那样的,可不一定真的是那样的。我经常在做语言调查后,通过大量录音分析语言材料,发现了很多有趣的语言现象。Bloomfield在1933年说的很清楚,语言学中任何generalization(结论)要用归纳法。开始的时候,什么概念都没有,看资料呈现什么东西,而且我可以证明它,才可以归纳出规则。同时,语言是一个系统,包含很多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所以很难讲我只做语音、还是只做语法,语言的各个方面都密切联系。还有一点,我认为要“解释”语言。我并不主张像形式派用形式解释形式。所谓用形式解释形式,比如有些学者看到汉语动词后面有两个论元,他们就写一个规则说“汉语句子动词后最多只能有两个论元”,而这个规则就被用来解释为什么汉语句子动词后只有两个论元。我认为这是完全没有什么解释性的规则。要真正解释语言,要靠交际功能、语义方面、语用方面等来达到一个真正的解释。韩礼德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不仅告诉我们这个结构怎么样,而且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我们要不仅解释功能方面的,而且解释历史来源,历史来源影响到现在的形态和用法。比如描写一个形态的语素,我们就要找它的历史来源,它语法化的过程。语法化不是词的语法化,而是结构的语法化。前不久我在香港参加一个会议,会上讨论问题之一是“句末的‘的’”,例如,“他昨天来的”,有些学者把“的”看作句末语气词,但我们从来源、功能、

结构综合来看,这是个名物化的结构,也可以说“昨天来的是他”。所以,“的”是个“constitute”,而不是语气词。所以,我认为做语言学研究不能靠主观推断,要真实、客观、科学化。

薛:这样来看,可不可以概括为描写、归纳和解释?

罗:要看如何定义描写。有人认为描写是单纯的描述,不包括理论。在类型学中,我们的描写是包含理论的,这些理论指“basic linguistic theory(基本语言学理论)”。我们主张用比较传统的,大家都可以听得懂的理论。因为我们写东西不是写给明天的人看,而是写给一百年以后的人看,我们要写一个长久的记录,作为长久的贡献。这里我说的传统的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传统,是经过语言之间的比较之后逐渐科学化的理论。所以,我所说的描写不是形式派批判的单纯的描写,是有理论支撑的描写。

薛:不相信仅靠单一语言的深入研究,就能概括出人类语言的本质,而必须通过跨语言的观察比较来获得对人类语言共性的认识,这是语言类型学的一个理念。那么,语言的个性与共性也是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对象。您能深入谈一下语言的个性与共性问题吗?

罗:每一种语言都是独特的。它是一套 social convention(社会规约)。不同语言的制约方式不同,是受不同社会背景的影响。所以一种语言所制约的东西,也就是一些语言结构,是只属于那个社会的。当然,人类在生理和心理上存在着共性,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有很多类似,所以语言之间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但每一种语言都有独特的发展。我觉得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翻译,只有用另外一种系统,另外一种世界观去解释。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世界观。比如说英语的“soup”和汉语的“汤”,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英语说“吃汤”,汉语说“喝汤”,可代表的典型食物不同,运用的范围不同。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内涵、典型的代表。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范畴,分类方法都不一样。为什么每一种语言有自己的价值,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也是每学一种新的语言最有趣的地方。我只回英语的时候,我觉得“shrimp”“prawn”“lobster”是截然不同的动物,学了汉语以后,发现一个“虾”,一个“大虾”,一个“龙虾”,好像是一回事。每一种语言看世界的角度不同。好像多学了一种语言,就多了一个世界,脑子就灵活了一些。我不相信有“普遍语法”,主张通过跨语言的观察比较来获得对人类语言共性的认识。

薛:请您谈谈近些年来国际语言类型学研究的走向。

罗:有几个派别。有的人主要做大量的比较,有的人研究“universals(普遍性)”,我不认为存在必然的“universals”。La Trobe(拉筹伯大学)的语言类型学中心(RCLT)在国际语言类型学届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采取的是科学的描写方法。在该中心,每一个人都在写参考语法,每一个人都要做长期住在某个村寨的田野调查,然后描写,描写包括参考语法、词典和长篇语料。比如该中心的主任 Dixon 教授,做了五六种不同语言的这样的调查。一部分是做深入的了解,一部分是做调查,另一部分是大家在一起讨论,个别语言表达某种语义领域的方法,然后作比较,比如,想了解示证范畴(evidential),有的语言有示证标志。要表达某种事情,要说我有什么根据来说这个事情,是听说的,还是亲眼目睹的,这就是示证范畴,世界上大约有四分之一的语言都具有这个标志。汉语没有,英语也没有,羌语有,日旺语有。像

日旺语动词演变有一种词缀,代表“是听别人说的,不是亲眼目睹的”。如果从类型学角度来研究一种语法范畴,我们一般会找很多名调查不同语言的人来到我们中心,每个人报道这个范畴是怎么表达的,然后经过这么多人的报道之后,我们有个总结,我们看到的是哪个方面,哪些结构,就可以归类,可以找到一些语言之间不相同但类似的方面。往往总结一个结构要看几百个参考语法。中心已经做过的结构有连动结构、词的定义、补语结构、命令式、关系子句等等,我们轮流,做每一个语法范畴。我觉得这是比较科学的方法。

薛:您挽救了羌语这一少数民族语言,在中国语言类型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请您谈谈您是如何挽救羌语的以及自己下一步学术研究的打算。

罗:你问我如何挽救了羌语这一少数民族语言,其实挽救说不上,挽救是它原来是濒危语言,现在不是。我只是记录了羌语的一小部分,如果濒危的话,以后会消失,消失后起码有这么一个记录,如果要挽救的话,那就是说也许可以编一些教材,帮助他们教这个语言,鼓励他们在家里用这个语言,那个我没办法做,因为汉语的影响很大,他们都在转说汉语。我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怎样记录语言,今年要在北大《语言学论丛》发表。我觉得要搜集真实的资料,长篇语料也好,录他们讲话、对话、讲故事,让他们讨论他们自己生活的一些经验,都可以。记录以后,你就分析,分析出它的词汇、语法结构、形态,然后描写,这就是我们做的工作。我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基本上有三个:羌语方言地图计划;独龙、日旺、阿依语田野调查与研究计划;藏缅语句法形态比较。此外,我还在准备写一部有关信息传达的性质和语言的发展这方面的书。

薛:中国的语言资源非常丰富,上百种民族语言,还有汉语自身丰富的方言,再加上汉语的演变,可以说拥有充足的跨语言研究的条件。目前,国内有一批语言学者致力于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最后,您能谈谈您个人对中国大陆语言类型学研究现状的看法吗?

罗: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们(大陆语言学者)要找到自己的路,这是对的。我觉得如果完全是靠自然的语言,就不会错。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受形式派的影响。现在比较多的,就是用归纳法,用归纳法就不会错。母语也好,不是母语也好,还是那个办法,搜集一些自然的语言,然后分析。最近也有很多人在作比较,比较是好事情,可比较要有意义的比较,并不是抓很多语言放在一起就是有意义的比较,要看比较的对象。还有,要做一研究,我发现,尤其是研究生,开始做时,他们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他们要做什么。比如说,如果要看某一个语言能的语气词,你要先了解什么是语气词,你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所以,基本上是一个问题,就是要一个明确的方法。我觉得方法论很重要,大家都在讨论方法论,这很好,到最后(能够)得到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总的来说,中国的语言类型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还相对滞后,但是有很大潜力。

参考文献

- [1] Keith Brown.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Z]. (2nd ed.) London: Elsevier, 2006: 153-154.